

编者按

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5届会议于3月15日开幕。围绕会议优先主题,各方在大会执行局所提供《商定结论(草案)》的基础上进行磋商,将于3月26日大会闭幕前表决该文件。目前,相关主题的部长级圆桌会议、对话会、边会及其他平行活动正陆续展开,尤其关注新冠疫情对女性造成的影响、消除对参政妇女的暴力、消除妇女平等参与公共生活的障碍等议题。会议高度重视即将举办的“平等一代”论坛,鼓励更多具备包容视野的年轻人成为倡导性别平等的领导者。

在实现性别平等转折点把握决定性机会

——关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65届会议(下)

■ 李英桃 王天禹

作为专门致力于促进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与女童权能的全球决策机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旨在讨论妇女所面临的不平等与歧视问题,引导公众关注社会禁忌并打破刻板模式、增进全球妇女和女童权利。每年3月召开的妇地会年会则集中商讨全球在性别平等、赋权妇女与女童方面取得的进展、确认其面临的挑战、制定相关政策并确定全球标准。大会就其优先主题形成的成果文件称为《商定结论》。

本届妇地会于3月15日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普姆齐勒·姆兰博·努卡等联合国官员和来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根据会议安排,相关主题的部长级圆桌会议、对话会、边会及其他平行活动正陆续展开。围绕“妇女充分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及决策,消除暴力,以实现两性平等和赋权所有妇女和女童”这一优先主题,各方在大会执行局所提供《商定结论(草案)》的基础上进行磋商,并将于3月26日大会闭幕前表决该文件。

关注疫情“女性面孔”,化危机为转机

古特雷斯在开幕讲话中提出,疫情给妇女和女童带来灾难性影响,疫情危机有一张“女性面孔”,深刻反映出政治、社会、经济体系中存在的性别不平等。努卡强调,这一流行病是我们所经历的最具歧视性的危机,它给最无力应对它的人带来最艰难的挑战,影响到全世界妇女的生活,更把许多女性困困在暴力之中。

《商定结论(草案)》中强调,通过为相关工作组、常设委员会和其他决策机构设置性别平等目标、任命妇女和两性平等倡导者担任领导职务等办法,确保在决策机构和决策过程中,对新冠疫情的应对和所采取的疫后恢复措施具有性别敏感性。古特雷斯呼吁采取五大行动,以加强妇女代表性、参与度 and 领导力:一是废除一切歧视性法律;二是采取具体措施,确保妇女在任何位置都有平等代表性;三是以同工同酬措施等使妇女从事体面工作;四是通过应急计划应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五是寻找并支持致力于建设更加公正、平等世界的年轻女性领导者。

消除对参政妇女的暴力,把握实现平等的决定性机会

本届会议的优先主题涵括了“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和“妇女参与权力和决策”两个北京《行动纲



领》的重大关切领域,两者之间的联系也进一步突显出来。研究表明,随着越来越多妇女获得权力,在公共生活中对妇女的暴力和骚扰有所增加,针对活跃在公共生活中妇女的基于性别的暴力、网络欺凌和性骚扰也越来越普遍。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席穆尼尔·阿克拉姆在开幕发言中提出,妇女全面参与决策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具有内在联系,妇女参与公共生活仍受到阻碍,对妇女的暴力仍普遍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促进性别平等上都面临挑战。联合国大会主席博兹克尔在发言中也介绍了对参政妇女的暴力给妇女参政带来的消极影响:妇女因遭受暴力而无法行使投票权、不能参与竞选的情况普遍存在。

努卡在致辞中强调,本届妇地会是实现性别平等的一个转折点。当前人类面临两大挑战——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危机,这两大危机对妇女发展的影响尤为严重。决策者的政治意愿对决策至关重要,疫情已经展现出在决策机构中提高女性代表性的重要意义,但她们在决策中的代表性却不高。她认为,通过本次会议《商定结论》是提高妇女政治代表性的关键时刻。努卡借此呼吁参加妇地会的各方代表采取大胆行动。古特雷斯也在讲话中强调“性别平等本质上是一个权力问题”,妇女的充分代表性和领导力是前进的先决条件,她们必须处于疫后恢复工作的“前沿和中心”。

采取协同行动,消除妇女平等参与公共生活的障碍

于2020年12月向本届妇地会提交的《妇女充分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消除暴力,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全体妇女和女童权能的秘书长报告》中提出:实现性别平等是一项集体责任,需要男女同心协力,完善现有制度。若有更多妇女进入决策机构,她们之间就能建立更强大的联盟,以推动促进性别平等法律、政策和预算的制定与实施。为消除阻碍妇女平等参与决策及在私营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障碍,秘书长报告、《商定结论(草案)》和与会者发言中都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和建议。

在部长级圆桌会议中,各国代表介绍了本国促进妇女政治参与和预防、消除对妇女暴力的经验与挑战。例如,伊朗政府明确政府官员中妇女所占比例要达到30%,目前该国妇女参政率已从7%上升到25%,并希望尽快达到配额要求;哥斯达黎加代表介绍了该国女性领导者相互支持,建立推进性别平等、预防暴力联盟和网络的经验;法国女性高级公务员比例已从2013年的32%增加到现在的37%,但仍未达到法律规定的40%的目标,该国代表认为,妇女参政水平低不仅损害妇女权益,也损害全社会福利;西班牙将推动性别平等、增进妇女和女童权能视为该国外交政策的“脊梁”,等等。

第65届妇地会执行局准备的《商定决议(草案)》提出的目标是:使男女同等地担任所有公职、

参与决策,消除阻碍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暴力行为。其中所提具体举措强调了不同层次的协同合作:其一,加速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国际文书,在实现性别平等、赋予所有妇女和女童权利上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需要确保发挥其协同作用;其二,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应在授权范围内与其他相关国际金融机构、利益攸关方一起支持会员国,并应其要求,努力确保妇女充分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和决策,消除暴力,实现性别平等、增进妇女和女童权能;其三,呼吁推动联合国妇女署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增进妇女和女童权能中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协调联合国系统、动员民间社会、私营部门、雇主组织、工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所有层次上,支持全面、有效和加速实施《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及“2030年议程”等国际文书中有关妇女充分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消除暴力,以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强全体妇女和女童权能的目标。

重视代际合作,力争成为“平等一代”

“平等一代”论坛在本届妇地会开幕讲话中被多次提及。该论坛目的是讨论两性平等的紧急行动和问责问题,为规划未来之路、加快实施1995年北京世妇会性别平等目标提供重要契机,将分别于2021年3月29日至31日在墨西哥城、6月30日至7月2日在巴黎举行。

2021年3月19日,“平等一代”青年工作组、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秘书长青年问题特使办公室联合举行了一场高级别对话,以检视不同世代共同领导和相互问责的含义,提出必须消除妨碍妇女平等参与决策和在私营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障碍,并期待与来自不同群体、对社会更具包容性视野的年轻人共同致力于性别平等。该对话活动为人们提供了在“平等一代”论坛启动之前确定青年优先事项的机会。

应该说,“平等一代”论坛是一次主要面向年轻人的平等行动,既表明北京世妇会召开25年以来全球妇女运动的代际更替与精神传承,体现出不同人群共擎火炬,为实现性别平等不懈奋斗的精神,也表达了国际社会加速行动、争取早日实现性别平等、赋权妇女和女童的决心。努卡将其与第65届妇地会并称为“实现性别平等的转折点”。

正如博兹克尔在开幕讲话中所呼吁的,“团结起来,我们就可能成为平等的一代”。让我们团结起来,为“妇女充分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消除暴力,以实现两性平等和赋权所有妇女和女童”而努力。

(李英桃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王天禹为该系博士生)

研究·视窗

《董事会领导权结构的性别效应与企业绩效》

作者:许为宾 豆秋杰

本文检验了董事会领导权性别结构究竟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以及这种关系如何依赖于性别地位差异而发生变化。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14—2018年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在董事长和CEO两职分离的情形下,相对于董事会领导权同性结构,董事会领导权异性结构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董事会领导权异性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受到性别地位的影响,具体来说,董事会领导权异性结构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在“男上女下”的性别结构形式中更显著。进一步考虑企业的产权性质进行检验发现,“男上女下”性别结构对企业绩效的积极效应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来源:《技术经济》2021年第3期

《社会流动与传统性别意识》

作者:李姚军 王杰

本文依托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2015年数据,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为例,使用对角参照模型方法,分析代际流动对女性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的性别意识存在着明显的阶层差异,同时流动轨迹、流动方向 and 流动距离也对女性的性别观念具有显著影响。向上流动,尤其是长距离上向流动,能促进提升女性的平等意识,促进社会的平等和进步。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2期

《歇斯底里及相关病症认识史中的权力逻辑》

作者:张虎

“新歇斯底里研究”从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揭示了人类对歇斯底里的认识历程,“体现了科学、性与唯众取宠的难以抵抗的掺杂”。它过往的病因论暗含着子宫左右女性身心的观念,承担着规训她们生育角色的社会使命,是对她们身体的病态化、性欲化和道德化塑造的一种形式,而男病患则在医学话语中受到了不同形式的漠视。对于歇斯底里及承袭其文化角色的相关病症,正确的“治疗手段”在于摆脱性别主义的医学话语或男性中心的研究视角。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年第3期

《出版中女性称谓的性别特指现象研究》

作者:任君

性别平等是指男女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待遇。由于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同以及社会对女性身份的构建,使得女性在各领域很难与男性一视同仁。在出版中,关于女性人物的叙述多加入性别前缀与和男性区分。然而,这种做法是否带有歧视倾向及必要与否有待商榷。本文就出版中的女性性别特指现象,以百科类图书为研究对象,探索特指的作用及影响,并试图规范出版中关于女性的表述方法。

来源:《出版参考》2020年第4期

(素波 整理)

一线调研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成为高龄老人居家养老有力支撑

——基于北京的调研数据

· 阅读提示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整合利用存量资源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当前,高龄老年人口急剧增长,高龄老人照护困境不容忽视,这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展不健全具有重要联系。为此,应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优势,为居家养老老年人提供便捷性、多样性的医疗卫生服务,减轻照料者负担,提升老年人幸福感。

■ 高华 杜声红

自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数量只增不减,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根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数将突破3亿,我国即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与此同时,随着医疗科技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高龄老年人口急剧增长,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成为老年人口中增长最快的群体,我国高龄化态势日益凸显。

高龄老人照护困境

高龄老人是老年人口中的脆弱群体。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机能下降,因各种疾病或残疾而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对长期护理照料及医疗服务的需求远高于其他年龄段老年人口群体。受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等多种因素影响,以家庭为依托、以家庭成员为主要照料者的居家养老目前仍是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首选的养老方式,这种养老模式实际上主要依赖家庭中的中青年子女提供长期照料服务,使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子女面临较为沉重的家庭负担,劳动力潜力难以充分释放。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9)》显示,北京市老年抚养系数为44.3%,意味着北京市平均每2—3名劳动力就在照料1名老年人。笔者在2020年开展的“北京市职工工作和家庭责任平衡状况”专题调研中也发现,在家庭中有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需要照料时,由职工本人长期承担照料责任的比例高达57.8%,其次是配偶占38.5%。工作日平均每天用于照顾高龄老人的时间约为105分钟。由于高龄老人中患两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情况更为普遍,依赖长期的照料护理,受

访职工均表示照料负担沉重。调研还发现,职工普遍反映高龄老人居家养老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高龄老人出门就诊是一项“大工程”,由于身体各项功能的萎缩,外出就医非常不便,日常护理、小病去大医院就诊现象日益突出,给高龄老人、失能或半失能老人的照料带来极大不便。访谈中一位职工提到,家中85岁的母亲因多年慢性病的困扰几乎处于半失能状态,仅吸痰这一项目日常性的护理就需要救护车转送至大型医院,并且耗费一天时间,给职工造成经济、时间、精神上的多重压力。

高龄老人照护困境成因

上述受访职工家中高龄老人遇到的医疗照护问题实际上是当前我国城市高龄老人居家医疗照护需求难满足问题的一个缩影。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社区卫生机构服务项目多样性不足。目前,社区卫生机构在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服务项目上仍然难以和大型医院相比。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主要以给老年人开药、常见病诊治、体检、健康教育和健康咨询为主,在疾病康复后的护理、日常慢性病的护理管理等方面相对滞后,由此导致了高龄老人吸痰等日常性护理也需要辗转至大型医院问题的出现。

二是社区卫生机构上门医疗服务未落实到位。2016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明确医疗机构以家庭病床、巡诊等方式开展的医疗服务,属于合法执业行为。目前,全国仅有小部分城市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上门医疗服务,此项服务覆盖面不够。此外,北京、上海等城市虽鼓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提供上门诊治等服务,但由于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及明确的可操作性标准,社区卫生人员对提供上门医疗服务存有顾虑和担忧。在调研过程中,笔者进一步发现,提供上门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其服务内容以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康复指导、心理咨询等卫生保健为主,远不能满足目前居家高龄老人的医疗照护需求。

三是照料高龄老人的家庭成员普遍缺乏医疗护理知识。在高龄老人的护理过程中,需要额外注意因护理不当而引发的一系列并发症问题。居家养老的高龄老人主要依赖家庭成员特别是子女的照料,但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护理技能,家庭成员在照料老人的过程中往往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境,面临较大的照料焦虑和压力。由于照料担忧较多,进而加深了对医疗卫生机构的依赖,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

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 高龄老人居家养老中的作用

医疗服务是养老服务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居家养老作为最经济最便捷最现实的养老模式,需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以确保居家养老持续推行。充分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方便、快捷、综合、价廉的优势,为居家养老老年人提供便捷性、多样性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减轻照料者的负担,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还能有效提升老年人的晚年幸福感,与我国健康老龄化的理念相契合。

一是完善上门服务顶层设计。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与上门服务有关的政策文件,对居家养老上门诊疗服务项目、服务价格、服务规范、权责明晰等方面给予明确规定,使上门服务有章可循。同时,加大上门服务宣传力度,增强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服务意识,提

高居民对上门服务的认可度、信任度。

二是扩大上门医疗服务覆盖面。鼓励引导有条件的城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片区内高龄老人、不能自理和半自理老人、空巢老人与社区卫生服务团队签约活动,扩大家庭医生签约覆盖面。针对老年群体的个性差异和需求服务的多样化,提供不同方式、不同内容的护理和诊疗方案,精准对接老年人服务需求,让老年人在居住社区即可享受到高质量、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三是创新社区卫生服务方式。结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自身优势,多措并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突出便民、利民功能。为进一步做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全国已有多地开始探索为老服务新模式。北京市蓟门里等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在辖区内为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免费体检、健康宣教及咨询指导等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考虑到老年患者行动不便,北京市朝阳区4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在全市率先推行“送药上门”服务,有效减少了老年人到医院医疗机构就诊次数,受到了老年患者的普遍欢迎。

四是健全家庭照护支持政策。引导高龄老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子女家属提供照护服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定期定点开展老年人医疗护理讲座与培训,为老年人家属及子女提供疾病康复后的护理、日常慢性病的护理管理等方面的指导,为高龄老人及家属提供方便。这一方面能够弥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护人员数量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能缓解老年人家属因医疗护理知识缺乏而引起的护理焦虑与压力。

(高华为北京市工会干部学院讲师,杜声红为中华女子学院讲师)